

民国贵州风云人物

庞思纯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顾久

副主任 王德玉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 杨庆武

委员 翁家烈 张新民 张润生

李立朴 王任索

编辑部

主任 王任索

成员 郝向玲 王尧礼 郎启飞 胡海琴

目 录

自序	1
刺袁二烈士	3
力阻黔乱殉难的钟昌祚	9
武昌起义副总指挥王宪章	15
“贵州四杰”之张恣	22
贵州辛亥革命首功的张百麟	28
毕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平刚	37
周素园与民国贵州政治	44
贵州督军刘显世	52
任可澄的人生三部曲	59
政坛“奇士”戴戡	66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岳	76
王伯群与护国运动	85
黔军“少帅”王文华	92
乱世枭雄袁祖铭	101
“过渡”省长彭汉章	111
碧血杭州王天培	118
不一般的周西成	128
“半月省长”李燊	138
毛光翔与熊、王的政治角力	147
危机四伏的王家烈政权	154
民国历史的书写者——何应钦	163
谷家“三中委”	174
张道藩——政坛中的文化人	182

刘健群的盛衰荣枯	190
刘燧昌的日本情结	198
纵横捭阖的邓汉祥	204
布依将军韦杵	214
何绍周的抗战事迹	222
陈泰运与“苏北孤军”	229
赍志而歿的罗启疆	237
柏辉章与第一〇二师	244
王文彦与第一四〇师	255
牟廷芳其人其事	262
第八十五师五师长	269
陈铁的反蒋历程	278
王伯勋的戎马生涯	286
苗族将军吴绍周	295
芷江受降的中方代表宋思一	303
第八十二师的女政工队员汪柏龄	309
贵阳首任市长何辑五	318
贵阳《中央日报》末任总编辑庞伯鸾	326
杨伯瑶——贵州最后一位土司	333
华氏家族与贵阳文通书局	343
贵阳第一支笔——吴道安	348
后记	354

自序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认为：不能真实“记录人间过去之事实”，以及不能“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求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关系”的史学著作，如同“蜡人院中的偶像，死气沉沉”，不仅不真实，而且空洞苍白，造成的恶果是：不仅不能“益民智”，反而成为“耗民智之具”。

民国年间，外侮日深，内乱不止。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中国社会更加复杂，各种思潮大行其道，政治的对立更加激烈，人才的结构更加多元。由于社会背景及政治立场不同，是非观念与教育程度迥异，此时期贵州崛起的人才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他们或投身军旅，或从事政治，凭借胆识与才智打出一片天地，登上国家与地方权力中心；或留学东瀛、欧美，受过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熏陶，依靠专长跻身于文教、科研、工商、交通等领域……翻开史册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之役，贵州人敢为人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对国家、对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先后走出六十余万穿着草鞋、装备简陋的贵州军人，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奔赴救国杀敌的战场，在台儿庄及忻口战役、在南京、武汉及长沙会战，以及滇缅的诸次战役中，以他们血肉之躯与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抗击强大凶悍的侵华日军，书写了黔人抗战的光辉历史。

史学著作应该真实记录历史的进程和事件，反映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责任在于去伪存真，还原事实，摒弃习惯性思维，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秉笔直书其事功业绩。对于那些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亦应秉持史家笔墨，“不隐恶，不溢美”，切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将对方说得

一无是处。对历史而言，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主导者，是历史研究中绕不过、抹不掉的关键人物：历史离开了他们就不清不楚，苍白空洞，失去了以史鉴今的意义。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和谐，关键在于勇于正视过往的历史，努力消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复兴大业而奋斗。思想观念的改变，使中国的未来呈现出希望。近年来人们对历史有了担当，有了自信，有决心去疗治那些造成民众思想混乱、有碍中国社会和谐的顽症。

中国古代有“和而不同”的圣贤之教。在当今政府大力倡导“和谐社会”之时，笔者认为，“和谐”不仅能使我们与外国“和谐共生”，而且可以消弭国内社会矛盾。要化解海峡两岸旷日持久的对峙局面，应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

近年来贵州出版了不少民国年间贵州中共革命烈士及文化、教育、科技及商界人物的传记著作，而着笔于民国军政人员的书籍却很少。有感于斯，笔者决定撰写一部《民国贵州风云人物》的专著，以此充实贵州历史人物长廊。由于篇幅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为此敬请方家见谅！

刺袁二烈士

——张先培与黄芝萌

1911年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武昌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消息传出,各省为之响应。面对危及江山社稷的革命烈火,清王朝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在万般无奈之际想到了下野的袁世凯,企图以他的政治经验与铁腕来扑灭这场革命。袁世凯出山后,利用清廷、革命党的弱点,大玩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有感于斯,贵州人张先培、黄芝萌试图以刺杀手段来阻止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不幸功败垂成,为义献身……

(一)

张先培(1890~1912年),号心栽,贵阳人。祖籍麻哈(今麻江县)州。其父张梁,军人出身,官至安义镇总兵(提督衔)。民国《贵州公报》在《暗杀党张先培君轶事》中有如下文字:“父梁以军功起家,满清时代转宦滇黔两省。平苗制匪,历著功勋。云南临安之役,君从父兵间,亦与有力。”由此可见,张先培从小随父征战,培养了勇敢精神,磨砺了刚毅性格。

张先培幼入贵阳乐群学堂就读,受革命思想影响,立下报国之志。此时间的张先培,就令人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人谓“其眉宇间,顾常露一种蹈汤握火、奋往不平之气”。

清代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内忧外患频仍,革命风潮迭起。为了维系统治,清王朝加紧对舆论的控制,千方百计防堵革命思想的传播。时值留洋之风盛行,张先培亦想出洋见世面,于是上书贵州巡抚庞鸿书。谈到自己的理想,张先培有“盖将亲及海外文明,以为将来中国一旦改造之具。”庞鸿书认为张先培

年少轻狂,对此不予理睬。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张先培以“父荫”选送京师陆军贵胄学堂就读。到北京后,他接触志士,广交朋友,寻求救国救民之策。此间,张先培与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过从甚密。平刚是原乐群学堂创办者,是张先培的老师,亦是他崇拜的革命斗士。经平刚介绍,张先培加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

张先培之所以加入暗杀部,是有其内心深层次的原因的。在其心中,同盟会的青年领袖汪精卫有着极高的地位,尤其是汪在1910年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成而入狱后所表现的无惧无畏的精神令其倾倒。刺杀失败后,为表达为革命舍生成仁、视死如归的情怀,汪精卫所写的《被逮口占》四首诗,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五言绝句,经报界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汪精卫声名鹊起,天下无人不知,成为青年人的偶像。张先培就是这些青年中的一员,想效法汪精卫之作为,对革命作出贡献;另外一个原因是,张先培对广州黄花岗起义死难烈士怀有很深的感情,钦佩他们殉义救国的大无畏精神。每当张先培谈及广州起义死难烈士,立即神色凝重,慨然说道:“好男儿不当如此乎!”由此可见其崇敬英雄、景仰烈士的抱负。

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张先培大为振奋。这时,一位友人劝他道:“何不向某假精兵二千,驰往贵州为都督?”对此建议,张先培不以为然地说道:“都督非吾愿,人生当作马前卒耳,都督奚何足数哉?况北军方盛,天下大局尚未可知,敢遂爱吾身乎?”

时清廷迫于政权危机,起用袁世凯。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执掌军政大权后,一面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汪精卫,以此向革命军进行“和平”试探。

张先培认为袁世凯是清廷对付革命党人的最后一张王牌,亦是中國最有实力的军人,其老奸巨猾,野心勃勃,党羽遍及天下,今若不除,将是革命大患,于是制订计划,意在刺袁。

不久，汪精卫出狱，张先培闻讯后前去拜访，向其慷慨陈词，表达对国家前途的看法。汪精卫对张先培的革命热情“深敬服之”。当张先培将刺袁的打算告诉汪精卫时，对方认为时机不到，且袁世凯与清廷仇怨太深，“有反正之意”，若刺杀袁世凯，必将兵连祸结，天下大乱。经汪精卫的开导，张先培打消了刺袁的念头。

11月1~27日，清军相继攻占汉口、汉阳。与此同时，清军在攻陷山西之后，进攻陕西。随着战局直转而下，袁世凯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加购军火，谋借外债，离间独立省份，严捕京津党人，变卖清宫古玩以作军需。参谋长段芝贵又竭力怂恿，以上一切说明袁世凯均为镇压革命党而作准备”。

12月2日，在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的“调停”下，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同月18日，南北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再次谈判。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提出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等条件。北方代表唐绍仪则代表袁世凯向南方要挟。经过五次会议，双方达成停战与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

由于南北战事吃紧，议和议而不和，随着北军攻占河南、山东，袁世凯志得意满，大有一举摧毁南方革命党与革命军之势。这时张先培等得知，袁世凯企图“利用延长和议时间，以言论激北方与南方反对”，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愤慨之余，便与同志密谋，伺机暗杀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独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议和陷入停顿。这时袁世凯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持清帝退位。在内外胁迫下，孙中山只好作出让步，声明只要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推其为大总统……

面对袁世凯的步步进逼，革命党人的忍辱退让，张先培再也忍受不下心中的愤怒。他告诉黄芝萌、杨禹昌（四川人）等：“今日惟有炸袁乃可了也！”

得知袁世凯将于1月16日入宫晋见隆裕太后的情报后，张先培与同人立即制定行动计划，派人了解袁世凯出行的阵仗、路线，以及沿途军警、暗探所处的位置、防备措施，同时仔细检查行

刺的武器、炸弹，务求一击而中，致袁死命。

1月16日上午，袁世凯入宫晋见太后，将变更国体之事的益处再向隆裕游说一番。面对风雨飘摇、灭亡在即的王朝，以及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隆裕感到心力交瘁，无力回天，惟有沉默不语，泪流满面。袁世凯见此，毫无所动，大谈变更国体之事的益处。在其连哄带骗、劝吓结合下，隆裕败下阵来，以“优待皇室”作为清帝逊位的条件。袁世凯见目的达到，欣然应诺。

得知袁世凯进宫的消息后，张先培与同人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民国《贵州公报》对其行动前有如是之语：“怀炸弹手枪而出之，昂然语同人曰：‘吾能免者，吾当再；同人有免者，亦如是。死而后已。吾人固不必为共和国之国民，吾人不可不作共和国之雄鬼。必俟举天下无有为共和国之障碍物者，吾党方能取消，吾去也’。”随后与杨禹昌等奔赴祥宜坊酒楼一带设伏。

袁世凯向隆裕太后辞行后，已是正午时分，乘舆出东华门，然后改乘马车。袁的马车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朝着东安市场方向驶来，沿途大街两旁军警密布，戒备森严。当其行经丁字街时，突然从祥宜坊酒楼上扔下一物，轰然爆炸，接着响起枪声。爆炸半径离袁的马车仅数尺，炸中管带袁金标等随从十多人。虽然袁世凯毫发未损，但吓得全身战栗，面色苍白。待袁世凯回过神来，强作镇定，喝令立即捉拿凶犯。

谁也没有想到：当街面混乱时，张先培、杨禹昌等没有趁乱逃命。而军警搜捕时，他俩竟然躲在酒楼束手就擒。

张先培被捕后，立即被押送到军警衙门。面对严刑拷打，他铁骨铮铮，无所畏惧。当法官问张先培“受何人主使？”时，得到的却是轻蔑与沉默。第二天，张先培被绞死狱中，时年22岁。

（二）

黄芝萌（1888~1912年），字季明，贵定城关人。1904年，黄芝萌考入贵阳寻常小学（乐群小学前身）——平刚所创办“明宣排满之旨”的学校。受革命思想熏染，他曾参加自治学社活动。小学毕业后，入新军营任编修。

1910年，黄芝萌考入北京测绘学院。在京师，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接触到新的思想，认识了许多革命志士，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对清政府的统治反感与厌恶，武昌起义爆发后，经朋友介绍，他加入了京津同盟会暗杀部。

1912年1月16日，黄芝萌与张先培、杨禹昌等一道，参加刺杀袁世凯的活动。他带领第三组人员，负责第二波攻击。事败被擒，因搜出炸弹而遭受严刑拷打，然而他坚贞不屈，慷慨陈词，历数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在狱中，黄芝萌自知必死，留诗以表心志。其诗曰：

朔风砭骨不知寒，几次同心共此甘。在昔头皮拼着撞，而今血影散成斑。

天悲却为中原鹿，友死犹存建卫蛮。红点溅花飞满地，层层留给后人看。

三日后，袁世凯的鹰犬——有“屠夫”之称的陆建章来到监狱，用煤油将黄芝萌活活烧死。

(三)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承诺后，策动军队与政界，逼迫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15日，袁的阴谋得逞，就任临时大总统。

张先培、黄芝萌等刺袁及惨死狱中之事经报界披露后，在全国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人无不称赞他们的义举及宁死不屈的无畏精神。南北和议结束后，黄兴、陈其美前往北京，通过有关人士的帮助，终于寻找到张先培、杨禹昌、黄芝萌的尸骨，于是将其与同月26日炸毙宗社党首领良弼而牺牲的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合葬于三贝子公园（又称万生园）。因冢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仅一面刻有杨禹昌烈士的碑文，故称“没字碑”。

1921年5月1日，胡适之先生下榻天津青年会，是夜梦游“四烈士冢”，醒后感慨不已，作《烈士冢上的没字歌》以示钦仰赞颂之情。歌曰：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指彭家珍）！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

一弹使奸雄丧胆！

一弹把帝制推翻！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力阻黔乱殉难的钟昌祚

辛亥革命成功后，贵州宪政派为争夺大汉贵州军政府的领导权，藉贵州“公口（帮会）横行，局势大乱”为名，电邀滇军假道入黔镇压。为阻止这场损害革命、祸及民众的黔省乱局，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不顾个人安危，追踪滇军，力阻扰黔，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

新学熏染，军旅历练

钟昌祚（1870~1912年），又名元黄，字锡周、玉山，贵州开州（今开阳县）两流泉人。其幼年，家境贫寒，从父学，通经籍，年岁稍长，为廪贡生，入开州书院，勤学苦读之余，兼及经世之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天津人严修出任贵州学政。出于内忧外患严峻现实的考量，针对贵州文教落后的状况，严修锐意兴革，对书院进行全面的改革。他以省城南书院（又称经世学堂）为试点，手订《肄业条约》，令各州县保送优秀生员（秀才）四十人住斋肄业。经开州知州陈惟彦举荐，钟昌祚入选名单之首。

在经世学堂中，钟昌祚阅读到大批中外书籍，特别爱看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及宣扬新学的《申报》。在学者如云的教师中，对其影响最深的当数李端棻。

李端棻系贵阳人，中国近代教育的倡导者。光绪二十二年，他鉴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鹰瞵虎视，瓜分豆剖，向清廷上《请推广学校折》，从而揭开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序幕。戊戌变法时，李端棻热情满怀地投入挽救危亡的维新运动中，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鼓动者，而且是政策的制定者。变法失败后，他因“滥保匪人（指康有为、谭嗣同等）”而革职查办，流放新疆。1901年，李端棻

遇赦返乡，痛感外侮日深，国势颓微，便以培养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和民主理念的一代新人为己任。在其主讲经世学堂时，常常举行时事演讲，极力向学子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专题讲授“卢梭论”与“培根论”，大讲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从李端棻演讲中，钟昌祚了解到国内外的现况，意识到清王朝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于是有了学习军事的打算。他常对人说：中国屡遭侵略，关键在于国家武备太弱；其次清廷的统治维持不了一年，而革命非用武力不可。正因为如此，他转入贵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广西会党起义，战火延烧到黔西北地区，会党军一度攻占兴义县城，危及贵州官厅的统治。面对黔西北地区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西部巡防营兵员不足为由，选用武备学堂毕业生予以补充。

钟昌祚被分到兴义管带刘官礼部管理军务。对钟昌祚来说，带兵打仗是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然而做一个军队管理者却并非易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端正军风，整顿军纪，常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以此提高士气与战斗力；与此同时，他针对军营生活过于枯燥，士兵嗜赌成性的陋习，大力宣讲民族英雄的故事，编写通俗易懂的行军歌，以此丰富军营文化生活。然而刘官礼与钟昌祚意见相左，对其所为不予支持。钟昌祚不想受制于人，便辞职而去。

东瀛去来，投身政治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贵州巡抚林绍年决定在各府、州、县选拔俊秀之士留学东瀛。奏请清廷后，贵州派学生51人赴日留学。钟昌祚入选其中，于7月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

在日期间，钟昌祚悉心考察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较深的了解，意识到中国惟有改革，才能强大，才能免遭外人侵略。

时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在东京论战。经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杨度介绍，钟昌祚与康有为在东京见面。在这位昔日景仰的维新派领袖面前，钟昌祚纵论时势，慷慨陈词，毫无局促之感。当其“他日有为国家民族牺牲机会，岂可怜惜自己生命而苟活。以天地复载之身，报答亿万平民百姓，可谓值得。区区之我，何必怜惜”之语一出，康有为不禁为之动容，对这位来自祖国西南的留学生注目良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钟昌祚学成回国，任北京西警厅分警官。9月因祖父病故奔丧而辞职返里，旋受聘为开州劝学所总董、高等小学堂堂长。受任之后，钟昌祚常“竹笠芒履，短褐羸膝”奔走于乡野农家，劝其子弟读书。每逢场集，他登台演讲，力陈国家民族兴亡大事，用以激发民众爱国之心。

是年11月，为了因应清廷预备立宪的政令，钟昌祚与张百麟、周培艺、钟振玉等30余人，在省城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组建自治学社。会上一致决定以张鸿藻、张百麟为暂时理事。其后，随着队伍日益壮大，组织逐渐完备，选举张鸿藻为社长。

宣统元年(1909年)，张鸿藻辞职，钟昌祚继任自治学社社长。在此期间，他组办《自治学社杂志》、《西南日报》，通过报纸宣传，让民众更好地了解自治学社的诉求、理想；他创立法政学堂，设法官养成所、自治研究会、司法讲习所、监狱专修科，旨在建立新的司法体系；他建议贵阳巡警道贺国昌开办贫民工厂，收容乞丐、游民，并亲率贫民工厂人员从事修沟、清道等工作；他还组建妇女习艺所，除教学习工艺外，还鼓励她们读书求知。以上公益事业，不仅成为自治学社的形象工程，而且为钟昌祚赢得了声誉。

钟昌祚任社长初期，自治学社忠实执行该会“以赞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这一宗旨，并未提出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目标。经过两年的奋斗，自治学社社员迅速增加，分会遍及全省，达70余个，拥有10万社员，而且在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农务总会等民间团体中，均有学社成员。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该学社接受同盟会的主张，走上了反

清的革命道路。

1911年夏，钟昌祚代表《西南日报》赴京参加全国报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他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为革命活动效力。同年秋，辛亥革命爆发，贵州随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由于钟昌祚远在南京，因此被推为大汉贵州军政府都督府代表。其后各省选举临时参议员，贵州都督赵德全通知贵州选钟昌祚为参议员。

阻滇扰黔，成仁取义

自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之日始，自治学社受当时“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影响，基本上停止了活动。然而这时，宪政派耆老会头目郭重光却积极活动，公然对抗军政府。军政府内部的宪政派领袖任可澄、戴戡、刘显世等，为夺取领导权，一面抓军队，并拉拢哥老会，造成社会乱象；一面盗用枢密院的名义，致电云南总督蔡锷，极言贵州“公口横行”，局势大乱，恳请滇军北伐假道入黔，“代定黔乱”。

面对宪政派的步步进逼，自治派领袖张百麟却警惕不够，反击不力。宪政派见对方如此，更加肆无忌惮，加速夺权活动。

1912年2月2日，宪政派策动兵变，乱枪击毙五路巡防营总统兼司法部长黄泽霖，同时偷袭张百麟住宅。张闻讯及时藏匿，幸免于难。兵变得手后，宪政派立即改组军政府，随后唐继尧部滇军入黔……

闻知“二·二”政变的消息，钟昌祚与刘荣勋、安健商议后，立即从上海乘轮船前往香港，然后取道越南进入云南。2月7日，钟昌祚在昆明会见蔡锷，揭露贵州宪政派夺权祸黔之罪恶，敦请其收回成命，令滇军改道入川。

蔡锷一向倾向宪政派，并与贵州宪政派领袖任可澄、戴戡、陈国祥、王伯群等感情深厚，加之滇军入黔已有多日，自然对钟昌祚的要求不予理会。钟昌祚大感失望，便于9日在昆明《民报》发表《致滇都督蔡锷书》，曰：